

画布上留下的历史

——钟涵、侯一民、全山石、詹建俊谈革命历史画创作

本报记者 朱永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各种活动如火如荼。6月2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邀请曾为该馆创作过《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狼牙山五壮士》、《延河边上》等名作的老画家钟涵、侯一民、全山石和詹建俊讲述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往事,重温画布背后的沉重历史。

早在1926年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在各类课程中特别添加了“革命画”课程,以期发挥美术的革命宣传功效。这株“毛主席辛勤培育的美术革命幼苗”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作用更加明显。

侯一民三到安源

革命历史画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更大的重视,已经成为政治宣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们迎来了国庆10周年和建党30周年,刚刚被评选为“十大建筑”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也急需一批反映近现代革命历史的作品充实馆藏。这一时期,董希文、罗工柳、王式廓、艾中信等接受任务的油画家,创作了后来为人熟知的一大批革命历史画,当时的侯一民、詹建俊等人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侯一民因为此前曾经创作过表现煤矿生活的作品而被选中创作一幅反映刘少奇与安源大罢工题材的油画,接受这一任务时侯一民十分兴奋。作为1949年以前身居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侯一民对于“政治任务”有着个人解读:“那一代许多画家画历史题材是带着人生经验



东流黄河(油画) 钟涵

与感受去画的,是自己非画不可的,并不是谁给他的任务,而是自己在心里孕育了很多年的感动,他要表现出来告诉别人。”他的作品《青年地下工作者》中印传单的青年原型便是自己。

亲眼见过“困难中工人相互扶助的场景,和矿工结下了深厚友谊的侯一民3次来到安源,了解历史材料,筹划安源大罢工这一主题油画创作。第一稿突出“刘少奇一身是胆”的形象,并不让人满意。侯一民通过深入采访了解到,毛泽东最早到过安源,后来由李立三创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后刘少奇以“工人代表”身份到达安源与资方谈判。侯一民反复酝酿后,完成了刘少奇和矿工一起走出矿井的油画场面。画面中很多形象有矿工的原型,侯一民说这些形象都在他的心里,“当时工人提出‘我们不愿意做奴隶,我们不愿做牛马,我们要做人’的口号,工人阶级迫切的要求便成为我画作的主题,刘少奇是核心,是党的领导,但是我所体现的重心放在了工人的烈火干柴的要求上。”

感受“残阳如血”,山里苦等十八天

1959年创作《狼牙山五壮士》时詹建俊28岁,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不久。他回忆说:“我们当时是青年教师,正在上课的时候,当时的系主任和革命博物馆的同志把我叫到系办公室,拿了一个本子,上面有个革命题材的目录,跟我讲革命博物馆历史画的任务和重要性,然后希望我能够从中选一个题目。”因为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个故事比较熟悉,詹建俊把“这个重要的国家任务”接了下来,此后多次赴狼牙山体验生活。

詹建俊从北京到达狼牙山当地村庄时,虽然不可能预见一场全国大饥荒的到来,却通过每天吃到的混合面和野菜体察到某种苗头。然而真正让他感到苦恼的是领导对作品的审查和否定。油画《狼牙山五壮士》中5位战士屹立山头,摆出准备跳崖就义的造型,同时又像是耸立在山顶的丰碑。“当时有一种文艺思想,就是觉得表现英雄人物必

须要把他们放在战斗当中。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经过不同的审查,有一些领导觉得画面上五壮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准备跳崖,是对五壮士精神的一种歪曲,这种意见还很强烈。”詹建俊为此感到十分痛苦,“在宿舍里绞尽脑汁,最后又画了两张,一张是冲出战壕的,一张是扔手榴弹的。又有领导觉得还不如原来那个更能体现题材的特点,而且认为苏联题材的目录,跟我讲革命博物馆历史画的任务和重要性,然后希望我能够从中选一个题目。”

1960年,全山石作为罗工柳的助手参与创作油画《前赴后继》,画好后作品同样没有得到肯定,周扬认为“应将悲壮的基调改为悲壮”。全山石受此启发,创作了《英勇不屈》,几名战士围在阵亡倒地的烈士周围,得到的修改意见是把“革命”放在地上不合适,要求把下面的形象去掉。

全山石回忆,当时的创作,体验生活十分重要。创作《娄山关》时,为了感受毛泽东诗词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情景,他们在山里待了18天,“天天下雨,最后

一天终于出太阳了”。

“艺术为人民”天经地义

4人中年龄最长的钟涵成名最晚,1963年,他完成了《延河边上》的创作,一群人在河边回过头来远望毛主席和农民缓步走过的背影。营造诗意的画面氛围、表现领袖背影的独创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可。这张今天在钟涵看来并不成熟的作品,起初被评价为“不像”,此后得到的批判则是“歪曲毛主席的形象”。1977年,钟涵创作了领袖人物以正面形象屹立于船头和行进于波浪之中的油画作品《东渡黄河》。他自称为了弥补“过失”的这幅作品“过于夸大,脱离实际”,“那么小的船怎么可能站那么多人,领袖也不可能以那样的姿势站在船上”。

“不像”的问题不仅出现在钟涵的作品中。钟涵认为历史题材创作首先还是表现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仍然值得研究。而在侯一民看来,革命历史画不光是为了记录真实,其中牵涉到艺术的处理、艺术的概括、艺术的夸张和浪漫主义等诸多问题。

时隔半个世纪,人们再看这些成为文物的艺术作品时已然有了各种不同的情感和想象,当年为时代服务、表现革命历史的作品则成为又一段历史中的注脚,只是其中的复杂因素已远非这些注脚所能涵盖。

侯一民在演讲后说:“艺术为人民服务,艺术也应该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这是正常的。你们说我讲的话现在很少听到了,很让你们感动,可这都是最一般的道理,最起码的ABC。艺术为人民,这是天经地义的。”

开国大典旗杆与《血肉长城》浮雕恢复落成

本报讯(记者朱永安)6月21日,开国大典曾用国旗杆与浮雕壁画《血肉长城》形成文物与艺术品新的组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庭院与观众见面。

开国大典国旗杆高22.5米,当年由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而成,原立于天安门广场北侧,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91年由新国旗杆替换后立在原革命博物馆内,2007年拆装后在馆内库区收藏。《血肉长城》高4米,长17米,是美术家侯一民在1989年创作的

大型陶釉浮雕壁画。作品以近代中国历史为背景,表现了中国人民从苦难、觉醒、抗争、牺牲到走向胜利的艰难历程。该壁画原先安装在中国近代史陈列的展厅,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开始后对作品进行了保护性拆移。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表示,此次将历史文物与艺术作品一起展示在观众面前,强化了两件展品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和艺术审美价值,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与艺术并重”办馆理念的体现。

中国国家画院广聘英才

本报讯(记者续鸿明)中国国家画院第一届全体大会日前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书法家、理论家200多人参加了会议,畅谈中国国家画院的发展前景,共谋中国当代美术发展事业。此次大会既是中国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庆典动员大会,也是中国国家画院各专业委员会聘任研究员名单确定后的第一届全体大会。

会议宣布了中国国家画院院士、顾问、院委、各专业委员会研究员及艺委会委员名单。据介绍,院士11名,分别是黄苗子、王伯敏、黄永玉、潘鹤、欧阳中石、杨之光、詹建俊、沈鹏、方增先、刘文西、靳尚谊;顾问30名,包括力群、黄苗子、彦涵、王琦、朱德群、赵无极、王伯敏、黄永玉等;院委70名;各

专业研究员及艺委会委员共计285名。此次聘任汇聚了国内各个专业领域的艺术大师和杰出人才,充分显示了中国国家画院的发展活力与开阔思路。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为进一步将发展思路落实,国家画院正在实施五大工程:聘一批大家,建一批画室,实施“中国美术发展工程”,实施“中国美术海外推广工程”,收藏一批精品力作。国家画院在硬件设施建设上也有突破,已在盘龙谷、国展、圆明园等地建立创作基地,不久将为每个研究员提供工作室。他在会上表示,中国国家画院着力建设“对内代表国家,对外代表中国”的美术国家队,旨在打造中国美术创作和研究最高平台。

顾利君竹画亮相银谷艺术馆



本报讯(记者李百灵)6月18日,顾利君画展在北京银谷艺术馆开幕,展览由中青旅集团、银谷艺术馆共同举办,共展出以竹子为题材创作的画作70余幅。

顾利君家住浙江余姚四明山,自幼习画,秀竹翠林与他朝夕相伴,以竹为友,终日画竹成为他的艺术追求。顾利君画竹不取折枝式,也不追求平面

构成,力求画出竹子秀骨铮铮的气度。作品画面层次丰富,枝叶茂密,呈现出竹丛的自然美,尤其竹根部位的用笔力透纸背。人民美术网总编、画家李人毅表示,“其作品脱去了孤芳自赏状态,把旧文人那种所谓出世脱俗的病态一扫而空,表现出当代画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世界。”

回声壁

■“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最丰硕而精神最贫瘠的时代。每个人长大以后,肩膀上都背负着庞大的未来,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搏斗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市场的不断扩张、商品的不停量产,其实都是违反人性的原有节奏和简单需求的,激发的是更贪婪的欲望。长期的违反人性,大家就会生病。当我们‘进步’太快的时候,只是让少数人得到财富,让多数人得到心理疾病罢了。这10年里,我看到亚洲国家的人们,先被贫穷毁灭一次,然后再被富裕毁灭另一次。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读者,并且邀请你和我一起,用你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

——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呼吁“慢生活”

朱德庸历时10年构思创作的漫画作品《大家都有病》,画出了这个飞速“进步”时代的众生“病”相。他的漫画书很畅销,很好玩,很深邃。对比时下内地漫画的轻薄浮躁,更可见出朱德庸观照现实的敏锐和智慧。

■“我不会上网,不会发短信,只会看短信,高速的生活让我感到了惶恐。聚精会神干一件事儿,会让我内心安宁,比如临摹维米尔的原作。我不可能达到维米尔的水平,使了大劲儿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从效果来看,只能是大体上接近。我是越画越觉得自己不熟悉,越画越觉得自己还差得远。”

——靳尚谊说“临摹维米尔越画越差得远”

真正的谦虚是需要底气的。吹牛说大话,不过是三流画家招摇过市的伎俩。

■“中国美术界、文化界自称‘大师’或‘被大师’的现象实在太让人难受和恶心了!这样的现象严重玷污了这一令人充满敬意的名称,以至于‘一听到‘大师’我就有不良的心理反应。一个区域的艺术文化成就,固然需要重头性人物为代表,为标杆,但更应该从艺术文化史的角度来评价其所做出的贡献,并考察其在当代的文化语境及国际的文化视野中体现的作用和意义。”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谈“被大师”现象

鉴于“大师”一词滥用成灾,建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时对其重新释义或干脆拿掉。

■“中国,不论是作为政治的国家还是经济文化的国家,都有这么大的体量。不要说中国,就是世界上还有点分量的国家,艺术品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跌价或者崩盘,那是没有过的事情。暂时低一点,有点起伏,那是有的。但是整体趋势上,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崩盘的事。崩盘的只是货币。我们看到的情况似乎是艺术品在升值,其实这是普遍地对掌握世界的权力以及货币本身不信任的表现。艺术就像是一种我们尚未掌握的化学物,它的结果永远无法控制和预知,所以它的稀缺性远远超过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艺术品的价值不是被高估了,而是太低估了,太便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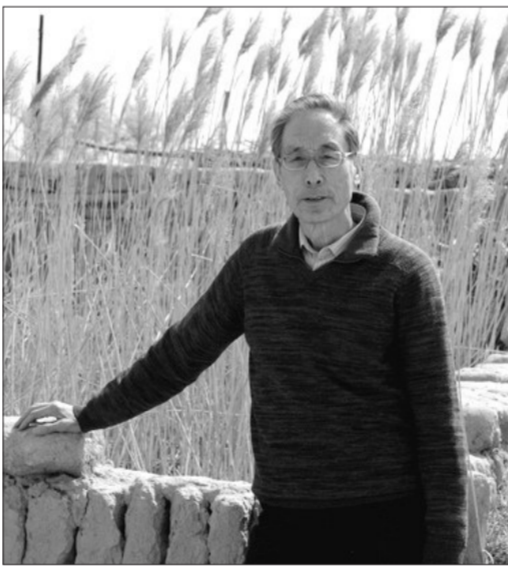
——艺术家方力钧说“中国艺术品市场不会崩盘”

谁都不想看到“崩盘”,关键看这个市场是否良性发展,个人的断言不足为信。方力钧的“光头”油画太便宜了?鬼才信。

续鸿明 点评

老水这个人

顾森



水天中

水天中是我们同学中的老大,我们习惯叫他老水。作为学者,老水学养好、人品好,早有定论;其治学严谨、眼界开阔,也是众所公认。老水的学术文论,文风朴实犀利,观点清晰明确,典故随手拈来应用自如,这些特色只要去读他的著述定有切身体会。我想上述方面,写文章者大有人在,无须我赘数。然而我与老水交情至深,他人格的高尚、仙风道骨的秉性,唯我最有体会。

1979年春到1985年夏这6年,是我与老水接触最多的时间。当研究生的几年常在一起,毕业后住在恭王府几年也常往来。对老水的了解和认识就基于这几年,以后都是这些认识的扩充和加深。

读研究生时,我和陈绶祥一直住在一个房间。老水常来我们房间,我们总是天南海北乱侃一通。因此过不了多久,我和陈绶祥就总结出老水这个人的特点:一是固执,二是无奈。前者是老水性格中深层的一面,后者是老水经常面对的现实和态度。

要说老水的固执,得先说老水的不固执。老水其实是很随和的,初次与他接触的人都说他好相处。正如有句话说:最爱笑的人也最易哭。套用这个逻辑:最随和的人也最固执。随和与固执是老水这个人性的两面。他是属于遇软易化、逢硬益坚的人。对那些弱小的、平等相处的、友好往来的,乃至有求于他的人,老水的确是随和的、好商量与好相处的。如果人或事不是以商量为前提,他就不好说话了,他的固执一面就会彰显出来。若是对他硬逼或者施压,他可能不计后果抗到底。

举一个例子。我们研究生毕

业没几年,碰上我院领导班子要换届。在未来副院长人选中,老院长有意在首届研究生中遴选一位。当时老水的呼声最高,按一些人的判断,老水当副院长已是板上钉钉了。就在此时出了一件事:有人反映水天中有反马列主义的言行。事情的缘由,是老水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提要登在报纸上,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美术成绩,也提到在美术史论研究中的“经学”倾向。从文章上下文看,他所指“经学”即指长期流行于美术研究中以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划分古今一切美术的观念。但有人认为这是对革命原则的否定。为此,已故的原美术所副所长温廷宽先生多次找老水,叫他写一个说明,事情就不言而喻。问题是这些人本身就是艺术理论家,完全明白文章所指。这样做就是故意歪曲事实,谁知道他们居心何在,他就是不写这个说明。温先生也委婉提到正是院领导班子调整的节骨眼上,劝老水忍忍,将此事化解。老

水死活不干,颇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操守。最后新院领导班子公布,自然没有水天中的名字。温廷宽先生后来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真没想到老水这么固执,撞南墙也不回头!

记得读研究生时,水天中、蔡星仪、苏伟堂3人住一个屋。这3个人在艺术问题上都很固执己见。老蔡最推崇四王,以四王为中国画的主臬;老苏口不离潘(天寿)先生,中国画的百川之水最后当然都要归到潘先生那里;而老水学术出身,对现代艺术自有定见。这3个人为一个艺术问题争起来,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房间经常是“三国演义”“腥风血雨”一番,还是各据一方,谁也奈何不了谁,往往吵到最后,都不讲话了。老水告诉我,每到这个时候,往往是其中一个人提出“喝牛奶!喝牛奶!”牛奶一喝,争执的话题自然就搁置不问了,又回到正常状态,该睡觉的睡觉,该看书的看书,该抹风油精的抹风油精。他们房间的灭火剂就是牛奶。我们同学中也有与老水争执得互不相让、僵在那儿的情况,但是不会因此而影响同窗友情。

老水的无可奈何,说明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不想招惹人、愿意与人为善的人。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我半开玩笑说,老水你当初为什么不娶几个孩子?那时是可以多生的呀。他以一种待之坦然而又无奈的口气回答:你还真别说这事,我只要两个孩子就申请绝育,结果还被批判,说是不热爱社会主义。现在提倡独生子女,我两个孩子,多出来一个,又不符合国策了。没有赶上趟。就像前几年,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是

提倡尊重老同志,多听老同志意见。现在我们老了,就变成要重用年轻人了。又没有赶上趟!

1975年的“反右运动”,他的父亲被打成大右派,连带几个子女成了右派。老水虽然没被打成右派,依然被送到农场去劳动锻炼。老水去的那个农场叫“花海子农场”,在嘉峪关一个偏远的地方。2004年我与“民居”调查小组的成员去嘉峪关调查民居,老水的弟弟水天达作为顾问兼组员同去。老水特别拜托,有可能去花海子看看。最后因联络问题没去成。水天达给我讲了许多老水在花海子的事,听后真让人心酸。2010年老水终于回了一次花海子,返北京后将几张照片发到我邮箱。我看了,回了他一句话:这是5000年前的花海遗址?意指此地太荒凉。老水发照片给我时附了一句:“重拾50年前回忆。”由此看来,他把这些磨难仅仅看成是一种人生经历,淡然处之。

老水结束花海子劳动后分回兰州工作。一个上级领导看到名单中的他姓名中带“水”字,问:“是不是水某某的孩子?”得到肯定答复之后,领导说:“让他到下面去继续锻炼!”结果他便离开省城去了平凉,直到1979年,因考上研究生才离开此地。在平凉,“文革”中老水被冲击,家庭也被整得很惨。但与老水相处这么多年,很少听到他对平凉这个地方的不满之语,倒是听他讲了不少在平凉的趣事。由此可见老水对命运的态度。

老水的无奈经常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趣事。莎士比亚写的那个哈姆雷特,有一句著名台词:生存或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老水在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处于自问自答的很多难之中。他50岁以后患胃下垂病,一位著名老中医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增加脂肪、蛋白质和热量摄入,不巧单位体检查出他胆固醇过高,于是有西医警告他:“不要吃肥肉,不要喝肉汤,减少蛋白……”开荤或者不开荤,这是一个问题。以后老水又被查出有白内障。按医嘱,看白内障者,为防病情恶化,饭后必须走走,活动活动;而有胃下垂者,饭后不能活动,必须卧床休息一天,方可起身做别的活动。饭后卧床或是不卧床,又成了一个问题,让老水犯难。每次看到一个老水那种无可奈何,那种如丹妻子似的彷徨迷茫,我和陈绶祥总是幸灾乐祸,而且还特邀老水一起幸灾乐祸。

老水长我近10岁,好多事是他早已经历过而我才开始面对。他的固执我不一定学得到,但无奈确是一种不错的处事方法。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充满无奈,但面对的态度会截然不同。正如同样是半瓶酒,悲观者会叹一口气:唉,只剩半瓶了!而乐观者则会高兴地喝:哟,还有半瓶呢!悲观是自寻混账,乐观是高人上人所为。我们都是凡人,断不可全悲,也不可全乐,悲乐参半而已。无奈便是这种超脱之举,庶几可行之。